

中西文化中的生死观

主 编 许志伟[加]
徐宗良

撰写者 (按章节先后排序)
沈铭贤 许国平
瞿晓敏 许志伟
徐宗良 曹开宾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文化中的生死观/许志伟,徐宗良著. —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5

ISBN 7-5627-0575-5

I. 中… II. ①许…②徐… III. 人生观-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N.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2891 号

责任编辑 王德耀

责任校对 吴越

中西文化中的生死观

主编 许志伟[加]

徐宗良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医学院路 138 号

邮政编码 20003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昆山亭林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字数 194 000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7-5627-0575-5/R · 544

定价: 23.00 元

如遇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地址:昆山市中山路 293 号 邮编:215300)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思潮与生死观的变革	1
第二章	生死观	18
第一节	中国传统人体生命观	18
第二节	儒家、道家、佛家生死观	33
第三节	西方哲学生死观	51
第四节	基督教生死观	71
第三章	健康、疾病观	99
第一节	中国传统健康、疾病观	99
第二节	西方健康、疾病观	112
第三节	西方老年观	140
第四章	苦难、自杀观	154
第一节	中国传统苦难观	154
第二节	中国传统自杀观	164
第三节	西方与基督教苦难观	177
第四节	西方与基督教自杀观	194

第五章 现代社会生死观再审视	
.....	211
后 记	225

第一章

文化思潮与生死观的变革

公元前 399 年，古希腊圣哲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在他坦然饮鸩之前，发表过一篇有关死亡的著名讲演。他说：“有绝对理由相信死亡是件好事。死亡不仅可以摆脱一切烦恼，不会像我那样因提出问题而获死罪，而且在另一个世界可以同荷马、奥德修斯等诗人、英雄交谈，向他们请教，其乐无穷！”无独有偶，大约 100 年后，中国古代的智者庄子说，人死之后，上没有君王的管束，下没有臣民的干扰，又没有四季事务的烦恼，笃笃悠悠，天高地远，比那些人世间南面而王的人还要快活得多。庄子妻死，他鼓盆而歌，以赞颂宇宙的生死之道。苏格拉底和庄子的生死观，特别是他们对死亡的达观态度，在 2000 多年前曲高而和寡，难以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今天，他们的生死观已越来越展示其远见和深刻，其合理因素被熔铸进当代的生死观中。

天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生在世，总免不了三灾八难、生老病死。对于生与死的思考和探索，永远伴随着人类，成为文化的一道重要而独特的风景。千百年来，中西文化中的生死观经历着诸多发展和变革、交流和碰撞，对此加以回顾和总结，将得到许多启发，有所教益。在 21 世纪，可以预期生死观会经历更为明显的发展和变革、交流和碰撞。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本书试图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和西方的生死观，除了叙述中西方古今最有代表性的生

死观外,还分别考察对身体、健康、疾病、痛苦等方面的看法,同时作一些比较和展望,为建立更为合理、更适应时代潮流的生死观提供学术上的参考。

一、生死观及其文化内涵

顾名思义,生死观主要指对于生与死的基本看法,包括如何看待生命,人到底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何在;如何看待生命进程中必定会遇到的疾病、衰老;当然,还包括如何看待必定会降临的死亡,死亡有没有价值,人们是否有权选择死亡,等等。生与死固然是自然的生理病理现象或看成是自然演变的过程,但人同时又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环境中,因而生死观不能不受到时代、社会 and 文化的深刻影响。正因此,生死观是发展变化的、多种多样的。从古至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产生了丰富多彩的生死观。

根据我们的初步看法,生死观大致有如下特点:

其一,相对稳定。《内经》中说:“人之情莫不恶死乐生”,是很有道理的。这不仅概括了中国人的感情,而且涵盖了外国人的感情;不仅概括了古代人的心态,而且预见了现代人的心态,适用于古今中外之人。为什么?这是因为生老病死首先是自然的生理病理过程,具有普遍性、稳定性。经过十月怀胎,人来到世间真不容易,虽然免不了要经受种种磨难曲折,但总能享受亲情之乐、创造之乐,而且肩负着传宗接代的义务,因而眷恋生是自然的。死亡意味着巨大的难熬的痛苦,意味着失去生之欢乐,因而厌恶死、畏惧死也是人之常情。古今中外的医学道德总是谆谆告诫医生要珍惜生命、救治生命,这客观反映和代表了这种人之常情。当然生死观也是变化发展的,但其变化的速度相当缓慢,变化的条件也相当苛刻。如果我们把生死观视为人生观、价值观的一部分,并把它与其他部分(如对经济价值、个人自由之类的看法)相比较,那就不难看出,稳定性是生死观的明显特点。

其二,相对深层。明代学者王阳明说得好:“人于生死念头,本

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传习录》）生与死关系到人切身的根本的利害，不止是生者或死者个人的利害，还涉及其亲属的利害。“生死攸关”，命都没了，还谈得上别的什么呢？故此，生死观总是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占居一块牢牢的地盘。生死关头，往往是最严峻最本真的考验。苏格拉底之所以名垂千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能坦然地勇敢地面对死亡。

其三，影响深广。由于生老病死与人人都密切相关，人人都必须面对生老病死，因而生死观影响之深广几乎是不言而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生死关头的考验上，而且表现为风俗习惯、礼仪等诸多方面。比如尸体解剖，在我国因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和“完尸”的影响，认为解剖尸体是极大的罪孽，会受到严厉惩罚，至今尸检率即使在大城市仍然很低，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了。而在西方，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临降世间本就是来受苦受难的，耶稣尚且被钉在十字架上，况普通人乎？人的灵魂是高贵的，躯体却是卑贱的。尸检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成制度，早已得到普遍认同。

基于上述对生死观及其特点的理解，便可以进而讨论生死观与文化的关系了。这里，我们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文化？据称，仅文化的定义就不下 200 种，真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例如：文化是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总和；文化是人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和行为模式；文化是一切精神的发展的总和；文化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智力的人为手段。我国的《辞海》这样界定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从词源上看，英语的文化（culture）一词，源于拉丁文 cultura，有修养、教育、礼貌等涵义。我国的文化一词，渊源于“以文教化”，含有典章、教育、品格、礼仪等意，以及通过这些来治理国家、开化民众的涵义。目前，学术界比较倾向侧重从精神生活、精神成果的层面来理解文化的内涵，以区别

于更广泛的文明概念。当然,并不排除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如青铜器、金字塔等)所体现和包含的文化。宗教、艺术、文学、科学、教育、道德、习俗、礼仪等是公认的文化领域。

不管什么文化,价值都是其核心的内容。“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现在,价值概念已远远超出商品交换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一个基本概念。这一基本概念通常又可以分为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这样密切相关的两方面。通过这两方面,人们对某种文化加以解读、区分和评价。

在分别论述了生死观与文化的要义之后,两者的相互关系也就比较清楚了。一方面,生死观受到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形态的深刻影响,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为什么中国和西方的生死观有所不同?为什么古代和现代的生死观有所差异?从深层上探究,文化是重要原因。比如宗教,要把握西方的生死观,就不能不研究《圣经》以及对《圣经》的种种解读。上帝在造人之后,把亚当和夏娃安排在伊甸乐园里,但他们却违反上帝的禁令,偷吃了智慧果,因而受到上帝的惩处。这种人类“原罪”的观念对西方人的生死观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迥异于中国。中国虽然没有西方那样浓烈的宗教传统,但独尊儒术却也把孔孟之道奉为类似宗教的程度。儒家颇具特色的孝的一套礼制,对中国人的生死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再如科学,现代科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揭示了生老病死的奥秘,不仅破除了种种误解和迷信,而且创造了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基因重组等等奇迹,是推动生死观变革的巨大力量。

另一方面,生死观又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依据上述对生死观及其特点的理解,生死观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形影相随的伴侣,牵动着每个人最敏感的价值神经,广泛地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生,事之以死,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孝经》)在生死存亡过程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社会共同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06

体丰富多彩的风俗、礼仪,不正是不同文化的生动展示吗?在宗教信仰和道德评价中,也不难发现生死观的影子。“哲学是死亡的练习”,柏拉图的这一名言告诉我们,对生与死的沉思是哲学的永恒母题。海德格尔更进一步把人的本质规定的“向死而在”,从而提升了生死观在哲学中的地位,以至出现了像“生命伦理学”、“死亡哲学”这样颇受欢迎的学科分支。1997年2月,英国罗斯林研究所宣布,用一只6岁母羊的乳腺细胞克隆成功小羊“多利”。这一个是世界最伟大的生命科学成就之一,引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激烈争议。羊和人都是高等哺乳动物。既然能够用羊的成熟体细胞复制出与其基因相同的小羊,那么,能不能克隆人呢?从技术上看,尽管难度很大,但并无不可逾越的障碍。然而,从伦理上看,人的生命可以随意复制、随意改组,人的尊严何在?价值何在?对此不同的回答折射出各自的文化观念。因此,这场争论像“安乐死”的争论一样,既是生死观的争论,也是文化的争论,具有丰富的深厚的文化内涵。

二、生死观的变革及其机制

比较稳定是生死观的特色,但又并非亘古不变。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那么,生死观的变革还相当激烈和繁重。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的一统天下,《圣经》是惟一的、至高无上的真理。按照《圣经》的教义,人生在世是救赎的过程,只有经受种种磨难,死后才能得救,升入天堂,过美满幸福的生活。因此,中世纪欧洲的生死观一反古希腊罗马那种享乐主义、英雄主义的生死观,而变成禁欲主义、厌世主义。这种生死观轻视、忽略了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而追求死后的“天堂”。到了近代,生死观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理性主义、自然主义的生死观成为主流。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思想家们就告诫人们要重视现世的人的生活,而不要去追求靠不住的死后天堂。“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这铮铮之声表明新的生死观已在母腹中躁动。后来,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更把它发展到正因为生命是有限的,才要活得更充实更有意义的高度。然而,死亡终究是每个人都避免不了

的归宿,固然要重视生,但也不能轻视忽略死。因此,在高扬生命的价值之后,19~20世纪的一些思想家,如尼采、海德格尔等,又转而探寻死亡的意义。这种探寻不同于中世纪的宗教信仰,是深层的哲学沉思,它把死亡规定为人的本质的体现,从而在另一个侧面丰富和发展了生死观。

今天,在面向21世纪的历史时期,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滚滚浪潮中,我们正亲身经历生死观的重大变革。1978年9月,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布朗在英国呱呱坠地,引发了一场旷久而热烈的讨论。特别是安乐死,更触动了人们深层而敏感的神经,有力地推动着生死观的变革。从中国的情况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乐死便介绍进来了,当时人们颇觉新鲜和难以理解。不少调查都显示,安乐死已日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各类知识分子所理解和接受。虽然,至今尚未立法,难以施行。但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来看,它可能是生死观最深刻最重大的一场变革。

从生死观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它与文化思潮、文化观念的变革密切相关、基本同步,既是文化变革的表现,也是文化变革的一个部分或方面。下面,我们据此对生死观变革的特点和机制作一些初步的、简要的探讨。

首先,是传统的巨大力量。文化是讲传承、讲积累的,没有传承、积累,便形不成文化。文化传统一经形成,就是不可漠视的巨大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说:“传统不仅在天主教会中,而且在自然科学中都是一种势力。”〔2〕这种力量一方面推动人们按照它的规范去思想和行动,另一方面则抗拒、阻滞文化的变革,以维护既有传统的权威。传统表现或渗透在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文化观念、文化心理,以及风俗、礼仪、文字等文化符号中。

有人说人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有人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些都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人是文化的动物。其含义有两:一是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任何文化都是人的创造,因此人是文

〔2〕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13.

化的主体；二是人受文化的控制，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受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人又是文化的受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文化传统的巨大力量便易于理解。这种力量，主要通过文化传统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表现出来，而不同于强制的外在的力量。文化传统对于该文化圈的人，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和权威性。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受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定势，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比如，孔孟儒学对中华文化圈的人，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就好像《圣经》对西方人特别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或者释迦牟尼的学说对佛教徒那样。背离文化传统，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内心的责备，有时还会受到神权或政权的惩罚。

联系到生死观的变革，由于传统的抗拒，变革的速度相当缓慢。在长达 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我国的文化没什么变化，生死观也没什么变化。时至今日虽然正处于重大的变革过程中，但也受到传统的重重阻碍，步履维艰。欧洲从中世纪到近代再到现代，生死观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其速度也以千年计、百年计。而且，在变革的过程中往往不得不请出传统的亡灵，穿着传统的服饰，以合法的借口，争取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西方对《圣经》至今不衰的种种解读，我国对“六经”的反复注疏和转换，都说明传统的力量根深蒂固。

这里要特别指出，传统对变革的抗拒并非就是坏事，而是一种必要的保守机制。文化不是走马灯，必须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形成一定的传统，才会有权威性、亲和力。“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是正道。各领风骚三五天，谈得上什么力量呢？文化当然也要变革，但必须在传统的抗拒中，在传统的“刁难”中变，而不可能一帆风顺，无阻无挡。这样速度虽然缓慢些，却更稳妥，更有生命力。像生死观这样牵涉人们深层的根本利益的变革，尤其不能匆匆忙忙、草草率率，而要经受传统的考验，汲取传统的精华。传统也有负面效应，对此已有许多论述就不再重复了。

其次，是变革的压力。不管传统的力量多么巨大，在变革的压力下总是或快或慢、或大或小地要变的。这种压力来自外部和内部

两方面。

文化变革的外部压力主要指政治经济压力。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欧洲经历了中世纪的漫漫长夜。14世纪前后,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鹿特丹等城市逐渐兴盛起来,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商业、工场手工业发达,市民阶层也随之壮大。15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逐渐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转向英国、德国、法国和尼德兰的沿海城市。城市经济的发展,要求挣脱教会和封建贵族的控制,取得更多更大的政治经济的独立和自由。很明显,资本主义的商业和手工业要获得顺利发展,必须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让人获得人身的自由,并获得更多的现实的利益。这样,教会宣扬的现世的苦难和来世的幸福就不适应新兴的市民阶层的需要了。他们起而宣扬人的尊严,宣扬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宣扬只有现世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从而使生死观发生重大变化。到了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的时候,生死观的变革就更深刻和更明朗了。

政治、经济和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三个主导方面,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文化变革受政治经济的影响是很自然的。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也对文化的变革产生深刻影响,比如全球经济一体化,有力地促进了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和汇合,使文化的世界化成为一股潮流。今天的中国人,哪一个不亲身感受到市场经济对文化的巨大冲击?

文化变革的内部压力,主要指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引发的压力以及内在的结构变化。中国的封建时代“天不变,道亦不变”,生死观确实很少变化。但其中也发生过相当重要的变化,这就是佛教的传入中土。早在汉代,佛教就传入了中国,至隋唐而鼎盛。唐僧玄奘历经千辛万苦赴“西天”(印度)取经的故事在中国差不多家喻户晓。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仅就生死观而言,也带来了不少新的观念,比如生死轮回。佛家认为,人死之后会转世而生,今世的穷人来世可能成为富翁,今世的坏人来世也可能变为好人,关键在于活着的时候是否行善积德。按照中国上古的传统,人是有魂魄的。人死之

后(灵)魂升于天,(体)魄归于地,却没有轮回转世的观念。佛家向以慈悲为怀,主张尊重爱惜普天之下的一切生命,救人一命更是胜造七级浮屠。中国的本土文化同样肯定生命在万事万物中最为宝贵,尤其是人的生命比黄金还贵重千百倍,但似乎佛教更着重各种生命的平等。佛教传入中土后,经过与本土文化的诸多错综复杂的碰撞与磨合,终于站稳脚跟,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固有的生死观。

借着人(某种文化的信仰者、传播者)的和物(书籍、商品等)的载体而广泛传播,从而使各种文化之间产生交流、碰撞乃至变革,这是文化扩散和演变的重要机制,如同生物杂交具有优势一样,通过文化传播也能推动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取长补短、增强活力、逐步发展。文化封闭只能导致文化的停滞不前,甚至衰退、消亡。被誉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一次文化变革——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称为文艺复兴,主要是由于14~15世纪重新发现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宝库。在中世纪的漫漫长夜,欧洲人并不清楚欧洲的土地上曾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因为其典籍大部分保存在阿拉伯世界,当他们终于发现这批宝库时,既惊讶于古代文化的高峰胜景,又感叹当时文化的陈腐落后。于是,他们赶紧把流失的典籍再大规模地翻译介绍回来,并作为反对和变革封建神学的有力武器。这一实例生动地说明了文化传播引发的变革压力是巨大的,甚至是难以抗拒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政治经济互动的频繁,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强度和密度均非往昔可比,它所带来的变革压力也更大了。外国安乐死观念被中国引进和逐渐被许多人所理解,便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文化传播的显例。

文化是有结构有层次的。仅就生死观而言,从价值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生存的价值、健康的价值、死亡的价值三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又可分为个体和群体价值、暂时和久远价值,再进一步,这些价值都包含经济的、社会的、亲情的、心理的等诸多方面的联系,因此,文化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其内部结构任何一部分的变革,都可能牵动其他的部分。当生存的价值至高无上的时候,健康的价值就

会遭到忽视,死亡的价值更谈不上,或者只有负面的价值。同样,当死亡的价值被过分夸大时,生存的价值也会受到不应有的轻视和忽略。这种不平衡、不合理的状况,文化史告诉我们迟早总是要变革的,内在结构的这一部分变了,其他部分也会相应地变。

第三,科学技术的推动。这里说的科学技术是指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主要是认识自然,技术主要是变革自然,它们是推动文化变革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由于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广泛渗透而更加明显、突出了。从生死观的角度看,无论是对生老病死认识还是对生老病死的变革,科学技术的作用都至关重要。

爱因斯坦曾精辟地指出,科学是“高尚的文化成就”。〔3〕科学的本义为知识,是条理化系统化的知识。科学是以事实为基础,但又不能停留在现象的描述、经验的直观上,而要深入对象的本质,揭示事物的规律。因此,科学总是理解为抽象化的普遍的知识,例如概念、公式、定律、假说、理论等,生动地展示了科学确实是一种复杂的、高级的精神生产和智力劳动。对于生老病死,长期笼罩在朦胧的神秘的氛围中。在西方,《圣经》上说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最后一天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造出男人亚当,然后又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女人夏娃,这是普遍的信念。中国也有人附天数之说,诸如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360日,人有360(骨)节之类。当维扎里举起解剖刀探究人体结构的时候,当科赫等人发现病原微生物的时候,当魏尔啸提出细胞病理学说的时候,一种新的理性的生死观也就呼之欲出了。

科学不止是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还能通过技术的中介转化为神奇的物质力量。现代医学集科学和技术于一身,不仅充分利用生命科学的成就,而且充分利用物理、化学以及各门工程技术的成就,在提高人口寿命、增进人类健康、战胜各种疾病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创造出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基因重组等在自然状况下不可能发生的奇迹。1998年仲春,被誉为当代爱因斯坦

〔3〕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99

的著名英国科学家史蒂芬·霍金应美国总统克林顿之邀，在白宫作预测科学未来的讲演中说，人类自然进化十分缓慢，这种情况不久将改变。未来千年人类有可能重新设计自己，控制自己的进行，同时能改进基因，增强其脑力和体力。面对这种状况，人们不能不严肃地思考：生死观如何与现代科学技术相协调？一方面要适应科学技术，另一方面还要规范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这正是我们已经面对并将继续面对的严肃课题。

以上所述生死观变革的机制并不完备，更不深入，但已初步表明生死观的变革有其必然性。它遵循文化变革的一般规律并有自己的一些特点，记录了人类对自身的探索，折射出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的光芒。

三、当代文化思潮及其对生死观变革的启迪

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走进新的纪元。回顾已经过去的 20 世纪，展望降临的 21 世纪，人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和长期的冷战对抗之后，进入了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时期，各个国家、民族和社会共同体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频繁，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等把人类联结为一个“地球村”。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已见端倪，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主导经济。同时，人类也面临人口、能源、资源、环境、生态的严峻挑战，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更趋拉大等严重问题。

世纪之交往往是思想活跃的时期，文化问题受到普遍重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公然断言文化冲突将成为未来的主要冲突，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有可能联合起来反对西方文化。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在美国《外交》季刊 1993 年夏季号发表后，引起了众多的评论和争议。我们并不同意他夸大文化的作用，更不同意他把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敌对起来，但他提到的文化地位的提升颇值得引起重视。

当今文化思潮精彩纷呈，错综复杂，从本书关注的主题出发，

我们仅着重阐述以下几点。

1. 科学与人文和谐交响

丰富多彩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而言,通常分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大类。科学文化主要关注自然界,揭示自然事物的存在和规律,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结晶和标志。人文文化主要关注人类及其社会,探索人类的本质和价值追求,是人类自我认识的精神成果。人与自然是文化的两大主题,两种文化本来是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然而,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随着分工的日趋精细和复杂,两种文化逐步走向对立和分裂。这种对立和分裂成了19~20世纪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特征。

如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已开始从对立走向对话,从分裂走向交融。在我们看来,这是当代最引人瞩目的文化思潮,有可能成为未来文化发展的主导趋势。美国学者萨顿曾明确指出:“必须准备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在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这种新人文主义或科学人文主义“将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4〕英国学者斯诺在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讲演中,对科学与人文的冲突表示深切忧虑的同时,也热切希望出现“第三种文化”,即科学与人文相互交流和对话的新文化。〔5〕这种新文化当然不会一蹴而就,但其趋势已在诸多方面相当清楚地展示出来。比如科学家普遍表示要高举伦理的信念,关心成果的应用,用科学造福人类,科学哲学中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认为达到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才是最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广泛传播和普遍认同。可持续发展强调依靠科学技术,但又用以人为本来规范科学技术的应用,它注重人文精神,但又注入了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等理性因素,从而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医学扮演的角色。魏尔啸早就指出,医学不

〔4〕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 科学与哲学,1984. 4,143

〔5〕 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7

只是自然科学,同时也是社会科学。但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立的背景下,科学文化是强势文化,医学中也盛行生物医学模式。现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正在形成,生命伦理学、医学人文学也随之而兴。生命伦理学力图把生命神圣和生命质量、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统一起来,有条件地承认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以便更公正、更公平地分配和利用医疗资源。医学人文学探讨心理、社会等因素与健康 and 疾病的关系,并应用于临床实践。这些都与生死观的变革直接相关。可以预期,在科学与人文的共同交响中,医学还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2. 东方和西方协调合唱

与上述思潮相呼应,东方文化受到普遍重视,大有复兴和昌盛之势。长期以来,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而东方文化受到歧视,被认为是落后的、没有前途的文化。然而,在诸多全球性问题的困扰下,西方一些智者终于醒悟到,东方文化特有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观念可能正是医治“西方病”、“现代病”的良方。当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西方文化由于过于偏重科学、偏重物质,已处于深刻的难以医治的危机之中,东方文化重视精神价值,重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不仅足以弥补西方文化的偏颇,而且应当成为人类共同的追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普里高津在倡导建立人与自然的联盟时,也特别强调中国的有机自然观的现代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三者是统一的,不仅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要效法自然,而且天地自然是一个整体的自组织的系统。这一观念与现代科学的精神惊人地合拍。普里高津坚定地表示:“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达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6〕

在东方和西方的合唱中,医学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中医

〔6〕 从混沌到有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7